重塑民众情感:王世贞《严嵩传》的多重书写及情感表达

魏宏远

摘 要: 传记有塑造民众情感的作用,严嵩形象从其个人的“自赞”“像赞”到王世贞的传记书写,再到民间叙事、国家叙事,传主形象“翻转”的背后寓含着书写者情感表达的转向。严嵩传文本众多,书写过程复杂,王世贞较早为其撰成“权奸”传,并通过志传、诗传、史传等多重书写,从多个层面助推其入《明史》“奸臣传”。严嵩位居首辅,主政多年,与诸多文人名士交游,获得了大量文化资本,即使在失宠致仕情况下,将其列入“奸臣传”也非易事。为将其塑造成为“权奸”,王世贞撰写五篇严嵩传和一首诗传,或据历史事实“实录”,或发抒内心情感,特别是借助《鸣凤记》等传奇文本,利用声音和表演所特有的认同性和顺从性,将个人“攻击—对立”型厌恶情感上升为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认知和情感,从“民间”文化形态使其奸佞形象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广大民众也积极参与到严嵩奸臣形象建构当中。严嵩形象凝聚着王世贞个人及民众、国家的共同情感以及民族文化记忆。

关键词: 严嵩传;传记群;多文本书写;情感表达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4)02-0108-11

传记具有塑造民众情感认同、构建民族情感共同体的作用。目前有关严嵩传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①],这些成果比较多地关注严嵩是什么样的奸臣,而对其如何被塑造成奸臣,特别是对严嵩传的多重书写及情感表达等关注不够。在严嵩被塑造成奸臣的背后,遵从的是“历史事实”,还是“情感事实”?是事实判断,还是情感选择?王世贞撰写多篇“严嵩传”,对塑造普通大众的情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为此,本文拟以王世贞《严嵩传》的多文本书写及情感表达为例,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

作者简介:魏宏远,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人传记文体关系研究”(20BZW095)、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23jbkyzx004)阶段性成果。

① 如《严嵩评传》(曹国庆等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严嵩传》(张显清著,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等专书,叶晔《别体同传:论王世贞的互见叙事》(《斯文》2017 年 2 期)、张丹《严嵩传记文献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年)等论文。

一、严嵩“自赞”“像赞”与王世贞的摹画

所谓“相由心生”,像赞多是对传主正面形象的塑造。“无论一个人在表达什么,掩饰什么,他总是在传达自身,他的所有思想、言论与行为都存在于一个富有弹性的传记之网中”①。严嵩的自我塑造及其亲友“像赞”与王世贞的反面书写形成了强烈对比。像赞所关注的通常不是传主本来样貌,而是经过理解或带有主观色彩的文字摹写,以及书写者的价值判断及情感表达。严嵩传世画像并不多,像赞却有很多。目前所能见到的严嵩图像资料如《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中国历代人物图像集》《钤山堂集》等所附画像外,其余多是传记文献中的肖像描摹和像赞。严嵩外在形象主要来自其本人“自赞”、友人所撰“像赞”以及王世贞传记中的摹写。

对传主外貌摹写是书写者自我“心画”的一种呈现及个体私人化情感的一种表达。通过严嵩自撰像赞及友人所撰像赞的比对,可以展示出聚焦于严嵩“像传”背后的真实情感。载有严嵩家传的《介桥严氏族谱·少师介溪公传》云:“公神貌清癯,少羸多疾,尝有性生之嗟,通籍后卧疴钤山。”②家传显然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严嵩“体羸”,其中还记载严嵩自题诗“阙下简书催物役,镜中癯貌愧冠绅”,说明严嵩“癯貌”“体羸”是历史事实。

书写者笔下的严嵩容貌展现出较强的主观倾向性情感。严嵩形象是如何“被看”尤为重要,视觉形象的变化与书写者如何“看”有着密切关联。严嵩亲友及其本人对其样貌多作正面书写,陆深所撰《严介溪像赞(四首)》从正面摹画严嵩形象,云:“望之甚癯,其中则腴。即之也温,而多礼让。龙章凤姿,超遥埃溘之中正;笏垂绅雍,容廊庙之上真金。”③爱戴严嵩的陆深站在欣赏的立场,观察、书写严嵩,与王世贞的书写形成了较大反差。可知“立场”决定了观念,而“观念”又决定了书写者能看到什么,同时书写者理解传主的角度决定了传主形象的呈现方式。

严嵩《钤山堂集》收录他人为其所撰二十三篇像赞。像赞中有诸多主观体悟式相貌刻画,呈现出不同书写者内心的影射,成为与王世贞完全相反的“心画”。像赞往往有图有赞,是对左图右史传统的承继和发展。像赞一般是图绘与赞语并存,彼此互联,相互印证。图像具有历史记忆功能,以图证史,图像成为历史叙事的形象化展示;同时通过像赞的语言表达机制,图像与语言文献彼此互证。相较而言,图像较之文字更为直观,因色彩造型所需,像赞对传主形象有着知识性和审美性的要求,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展现书写者个体化独特感知。一般来说,历史人物画像多为“套图”,若不注明像主,甄别起来会有很大困难。严嵩当年权倾一时,画像较多,后来入“奸臣传”,流传至今的画像较为稀少。那么,在严嵩画像的背后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和观念支配下的视觉机制,且怎样投射出绘图者如何“看”以及“看”到什么。其实,像赞折射出的是撰写者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对传主的理解。由于对图像的认知、联想以及思想观念的差异,使人产生理解上的分歧。不过像赞虽能叙其事,却不能载其容,为此,像赞因凝聚书写者体悟式理解而使严嵩形貌有着较大差异。

严嵩《直庐稿》卷五《画像自赞》是其自我形象的摹画:“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不择利害为趋舍,不以誉毁为欣戚,闻善惟恐未行,检身常若不及。”严嵩这一“自赞”并未正面摹写相貌,且有文无像,主要以赞言志,其赞语为他人理解自我导引了方向。像赞一般先有“像”后有赞,赞文多题于图像之侧。因为有图像,赞文无需着意刻画传主形象,重在传递传主的内在精神追求。严嵩自称“不择利害为趋舍,不以誉毁为欣戚”,努力将自己塑造成道德完人,展示自我独特的精神品格,其另一自赞云:“其貌羸然,山泽之臞;其质恂然,西家之愚。胡为乎官登玉署,位首黄枢,秉国钧之久,膺皇眷之殊。”④这一像

① 梁庆标:《主体的复归与传记的挑战》,梁庆标选编:《传记家的报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 页。
② 《介桥严氏族谱·少师介溪公传》, 曹国庆等:《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3 页。
③ 《严介溪像赞(四首)》,陆深:《俨山集》卷三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严嵩:《直庐稿》卷五,明刻本。

赞作于严嵩晚年,是以自我欣赏的眼光展现“貌羸然”“质恂然”,且颂扬“彊学力善”,履道持正,“孤忠”自持,同时不忘感念皇恩。像赞是在论赞体影响下,产生出的一种文体。通过画面题赞,对像主心志予以阐发,有“存乎鉴者”的社会功能。严嵩当年应有不少画像,其《直庐稿》卷九“自题小像”云:“屏风围座几焚香,封罢词头坐玉堂。岂意暮年年七十,濡毫长此奉君王(右阁中宴坐)。”①这是一首在内阁静坐画像的自题诗,左诗右像,刻画出辅佐帝王的阁臣形象。此外,严嵩还有自我松间闲步的像赞:“元是萤灯雪案人,十年延阁掌丝纶。圣恩若许归田去,钤谷松间称此身(右松间闲步)。”②虽身在馆阁,却心慕归隐;严嵩一方面书写自我,另一方面又不断颂圣。通过撰写像赞,意欲传世留名。严嵩自题画像,不忘皇恩,将个人情感与君王家国联系起来,把家国情怀融入“自观”之中。这些像赞多写严嵩日常生活,呈现出一种有意让人观看的心态。

像赞既有对传主外在形貌的摹画,更有对传主内心品质的呈现,是书写者指引观者或读者依据赞语来理解传主,展示传主形象的一种书写策略。除严嵩自我撰写像赞外,陈昌积、湛若水、陆深等人也为其撰有像赞,呈现严嵩掌权时的形象。陈昌积《赞南京吏部尚书钤翁像(有序)》云:“昌积尝谒庐陵忠节祠,而观欧阳文忠公像矣。耸眉修目,面若胭泽,有文童相。及登杨文贞公堂,而见其广目方颡,面阔露齿寡须,背颇伛偻,然岂天授之背,将表见其负天下重器耶!谚所谓至人无貌,良然。世多言钤翁夫子长身矗立,瞿瞿不胜衣;眉疏如无,为寿鹤相。乃今重瞻望其状貌,清若文忠,而背负若文贞也,彬彬然鞠躬若君子哉。”③将传主容貌缺陷与美好事物相关联,将传主比作欧阳修、杨士奇那样有“相度”“相才”和“相业”者。所谓“相由心生”“至人殊貌”“其貌如心”,从欧阳修“耸眉修目,面若胭泽”的“文章相”、杨士奇“背颇伛偻”的“负重器相”,到严嵩“长身矗立”而“不胜衣”“眉疏如无”的“寿鹤相”“背负若文贞”之相,陈昌积认为严嵩“清”如欧阳修,“伛偻”如杨士奇,是一副“彬彬然”谦恭君子的样貌,这与王世贞笔下的严嵩形象有着巨大反差。湛若水云:“夫何宛宛之清人乎!胡然而仙乎!胡然而神乎!目之炯然,如曙辰乎!胡容之俨然,如循循乎!胡拱之翼然,如申申乎!胡中若偲偲而存存乎!”④湛若水眼中的严嵩“目之炯然”“容之俨然”“拱之翼然”,其像赞赞颂了严嵩清瘦谦恭的内在精神。湛若水与严嵩为“同年”,交谊深厚,年八十六“为嵩作《钤山堂集序》,反复推颂,颇为盛德之累。”⑤在严嵩任职礼部左侍郎、湛若水任礼部右侍郎期间,湛若水又为其撰有《赠大宗伯介溪严公之南都序》,还有《题扇寄严介翁阁老》⑥,另作《乙卯元日祝圣台即事步介翁大学士自述韵》,把严嵩比作“周公”,颂赞嘉靖帝为“舜日”“尧年”,将二者比作“明良相遇”,对严嵩的颂扬可谓不遗余力。⑦ 与之相类,同样身居高位的陆深也撰有《严介溪像赞(四首)》,其中一首云:“身居廊庙之上,心存山水之间。任当宰辅之权,享有神仙之乐。衣冠俨然,若在林壑。退自南宫,朝回东阁。”⑧陆深以严嵩为“当代之名臣”,着意突出其“衣冠俨然”容貌之优长。其另一像赞摹画了严嵩“扈从南巡”“恩袍晃耀,杂佩陆离”“文武兼资”“双瞳炯然”“八表是仪”“望之者曰此神仙中人”的辅臣形象。⑨

书写者与传主亲疏不同,所撰内容会有较大反差。相较而言,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对严嵩外貌的摹写转变了后人对其认知:“嵩长身,疏瘦如削,疏眉目,大音声。”⑩张廷玉等撰《明史》时抄录了这一内容:“严嵩,字惟中,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⑪王鸿绪《明史稿》也抄录了王世

① 严嵩:《直庐稿》卷九,明刻本。
② 严嵩:《直庐稿》卷九,明刻本。
③ 《附录》,严嵩:《钤山堂集》卷四一,明刻本。
④ 《宗伯严介溪先生像赞》,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三三,明刻本。
⑤ 《考功集提要》,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下册,清刻本。
⑥ 湛若水:《甘泉先生续编大全》,明刻本。
⑦ 湛若水:《甘泉先生续编大全》,明刻本。
⑧ 《严介溪像赞(四首)》,陆深:《俨山集》文集卷三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严介溪像赞(四首)》,陆深:《俨山集》文集卷三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四,明刻本。
⑪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列传第一九六,清刻本。

贞这一内容,万斯同《明史》则略有改写,称严嵩“瘦削而神王,温如也”。史传多以集体记忆来描摹传主形象,往往将人品、诗品与相貌联系起来。传主容貌经常与仕进及命运相关联。在完成严嵩容貌书写后,王世贞笔锋一转,写其未得志时,因容貌不佳而受冷落,“(严嵩)尝奉使至广西,道谒乡人李遂。当晏鹿鸣日,诸生前为寿,时嵩貌羸鹑衣,遂不复盼接。至是投刺见而讲钧礼。遂出叵测漫应之。次日始修门人礼,布币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向厌之,恐终弃之耳。其狷隘急睚眦如此”①。因“貌羸鹑衣”而受座师轻慢,后来严嵩大权在握,便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这种因容貌而生出的事端,引发王世贞对严嵩人品的评判。严嵩“貌羸”是一种历史事实,本无可厚非,可王世贞却将之与“道谒李遂”事件联系起来,进而引发“其狷隘急睚眦”的道德评判,将书写重心放在了揭示严嵩人品不佳上。王世贞对严嵩容貌多有贬损,往往将之与不好的事物联系起来,其《凤洲笔苑》卷五说严嵩“早岁颖悟精解,而体羸多病”。在《当庐江小妇行》中王世贞运用夸张嘲讽之语描写刻画严嵩形貌:“瘦若鹳雀立,步则鹤昂藏。朱蛇戢其冠,光彩烂纵横。”看似摹写严嵩外貌,实则以拟“鸡冠蛇”的“诛心”之笔写严嵩心术阴毒险恶。当然,这种摹写带有夸张、戏谑成分,以文学手法传递出书写者对传主的“心画”,表达出书写者的情感体验或内心感受,呈现出严嵩形象在书写者内心的投射。

清代京剧《打严嵩》中严嵩的扮相为“净,白脸”,是从民间视角理解的严嵩舞台形象,这一种符号化的“白脸”广为流传,与明代像赞中严嵩形象大相径庭。从明清至今,严嵩不断被重新理解、重新阐释,那么,严嵩形象变化的背后受何种思想观念影响,传主形象到底是由史料决定,还是由书写者的理解决定?如将《钤山堂集》《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红袍海瑞传》中的严嵩画像与清代京剧《打严嵩》中严嵩扮相对比,可知严嵩像赞注重对其内心情志的发抒,与王世贞的摹画有着较大反差,与后世“严嵩戏剧”中严嵩的扮相也相差甚远,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与严嵩形象不断走向民间有着密切关系。从历史事实的“貌羸”到京剧概念化、脸谱化的“白脸”,后人所关注的往往不是严嵩的历史事实,而是书写者所撰写的文本事实,或者带有书写者价值判断的“真实感”。而这一切的“反转”与王世贞对严嵩传的书写有着密切关联。

二、厌恶与憎恨:王世贞《当庐江小妇行》的情感表达

传记的不同文体、书写内容与书写者的情感表达有着密切关系。诗传作为传记的一种,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叙述传主生平事略②,创作者多藉此表达个人情感。袁枚提出“诗者由情生者也”③,李东阳提出“诗之所贵情思,而轻事实”④。相较史传而言,诗传以叙事抒情见长,能够比较多地呈现书写者内心的情感。即便是以叙事为主的诗作,也是在叙事中抒情。抒情则需借助叙事,抒情自身也有叙事性和意向性。

在人类情感中“攻击—对立”型情感含有“愤怒—反感—厌恶”等情绪。史华罗提出“与‘憎恶’有关的情感词汇,一般强调主体与对象间的不相容性(憎恶—愤恨):在这类情感类型中,主体或者具有恶意,或者怀有敌意(如反感、仇恨)”⑤。这种“攻击对立”型情感往往会影响创作者的诗文书写及情感表达。“批判性的文学作品,通过唤起共同的厌恶感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所以唤起普遍厌恶感是文学家的一种使命”,“共同的厌恶感的转变甚至可以移风易俗”。⑥ 王世贞对严嵩厌恶感的重塑则是为了唤起民众普遍厌恶感。

---

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也摘录这一内容。

② 饶龙隼《明代人物诗传之叙事》(《文学评论》2017 年第 5 期)认为“诗传”篇幅大且体式多为歌行排律,重在传人而兼顾纪事,遣词行文偏重于叙事,以传人纪事为归趣而饱含诗性。

③ 袁枚撰,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版,第 1802 页。

④ 李东阳撰,周寅兵点校:《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35 页。

⑤ 史华罗:《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对明清文献的跨学科文本研究》,林舒俐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326 页。

⑥ 谭光辉:《情感的符号现象学》,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95 页。

王世贞先后撰写五篇严嵩传和一首诗传①,以不同的情感模式表达对严嵩父子痛恨之情。《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写在严嵩败后,以讥讽嘲笑的笔调书写对严嵩父子的憎恨之情。王世贞采用更能撩动读者心弦的文学手法,以消除严嵩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影响。朱东润称:"世贞作此诗,亦所以泄私愤。"②掌控朝权二十余年的严嵩失宠致仕,王世贞长期淤积于胸的憎恨之情得以发抒。袁枚提出:"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③以叙事诗来抒情更为不易,为表达内心之情,书写者需认真提炼情感,采用铺陈、对话、夸张等文学手法,以便叙事生动。王世贞提出:"乐府之所贵者,事与情而已。"④那么,文体的选择是为了书写者便于书写内心之情,还是为了记录历史事实?王世贞《当庐江小妇行》所写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内心情感的真实?

据郑仲夔记载:"王中丞(王忬)为相嵩父子所害。(严)世蕃伏诛,人争取其肉。琅琊(王世贞)乃以百金买其肘,祭之。"⑤王世贞这种痛恨的产生,"无论是直观感觉上令人厌恶的东西,还是在经历了伤害之后令人厌恶的东西,事实上都是由观念和叙述引起的"⑥。《当庐江小妇行》作为新乐府诗,与古体诗创作者多写自己事相比,便于从第三人称视角叙事和抒情,通过对话、夸张等手法使文本更具真实性、叙事性和音乐性。乐府诗因易于传唱而更为广泛传播,那么,王世贞表达出的嘲笑、讽刺、憎恨情感是否属于泄"私愤"?他又是如何"以情及情",体验出严嵩的情感?同时又是如何进行情感表达?史华罗提出:"情感的历史只可能是表达情感的词语的历史。"⑦沿着情感词语的线索,我们可以理解《当庐江小妇行》中王世贞的情感表达明显不同于那些裹挟着作者主观情绪的史传中语词⑧,这些诗性用语更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当庐江小妇行》近两千言,王世贞于诗末引入"旁人"角色,以对话形式对"严嵩"的仰天长叹"我死不负国,奈何坐儿叛"作出回应,"旁人"以"大笑"嘲讽之。作者的激烈情感借助"旁人"之口喷薄而出:"惜汝一何愚。汝云不负国,国负汝老奴?谁令汝生儿?谁令汝纵臾?谁纳庶僚贿?谁朘诸边储?谁僇直谏臣?谁为开佞谀?谁仆国梁柱?谁剪国爪牙?土木求神仙,谁独称先驱?"借助叙事者表达情感情绪,"与《孔雀东南飞》不同,王世贞在追叙之前,又追加了九个'谁'字句质问,不仅强有力地发出了民间的声音,亦可视为对严嵩奸腐人生的一次另类追叙,与后面的'六十''七十''八十'三韵形成另一种互见叙事"⑨。诗中还采用讽刺手法:"为子能负父,为臣能负君。遗臭污金石,所得皆浮云!"甚至还使用了诅咒谩骂之语:"以此称无负,不如一娄猪!""以此称无负,不如一羖?!""以此称无负,不如鞴中鹘!""以此称无负,不如鼠在厕!"象征、隐喻、讽刺等手法的使用表达出王世贞对严嵩的憎恶之情。在"大笑"与直白的对话之外,许多本就附着负面情感色彩的词汇掺杂其中,作用于句、篇层面,使负面情感迁移至严氏父子;与此同时,这种特殊处理也使一些本该处于中性位置的词汇具有了鲜明的负面情感。这些艺术化的表达更多的是抒发书写者内心之情,而非陈述历史事实。

王世贞试图将个人私恚上升为可入"信史"的普遍型情感,或是为广大民众接受的公共情感。其

---

① 《凤洲笔苑》卷二《严嵩志》、卷五《讳志(一)·严嵩传》;《凤洲笔记》卷九《严少师嵩》;《弇山堂别集》卷四五《内阁辅臣年表》;《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四《严嵩传》。此外,《明诗别裁集》卷八评王世贞《钦鸡行》云:"应指分宜,言钤山读书时,天下以姚宋目之,故有'千秋不一见,见者国祚昌'之语。"

② 《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解题,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王世贞原作为《袁江流钤山冈当庐小妇行》,以下简称《当庐江小妇行》。

③ 袁枚撰,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④ 王世贞撰,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齐鲁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⑤ 《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郑仲夔撰:《清言》卷十《仇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⑥ 谭光辉:《情感的符号现象学》,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98页。

⑦ 史华罗:《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庄国土、丁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⑧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严嵩传》多用"嵩惧""嵩恚甚""(嵩)不快""恨世蕃""嵩恶之""(嵩)痛之""嵩以是益恨阶(徐阶)""嵩怒嫚骂""心爱之(世蕃)""嵩怒而却之"等语词表达严嵩情感。

⑨ 叶晔:《别体同传:论王世贞的互见叙事》,《斯文》2017年第2期。

《乐府变》序云:“时时闻北来事,意不能自已,偶有所纪,被之古声,以附于寺人漆妇之末。……不敢希太师之采,庶几以备异时信史一二云尔。”①意图借“古声”以传“时事”,从民间记忆视角以“备信史”之采。然而,《乐府变》属新乐府,能否“被之古声”?王鸣盛《蛾术编》认为:“《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用韵杂乱,全然不知古音,乃以支、微、叶入鱼、虞,以上声纸与去声寘为一,又通入他韵,至入声之滥通,更不待言。”②说明王世贞所言“被之古声”只是一种想象的“古声”。王世贞努力将自己作品“被之古声”的原因是人类听觉具有顺从性,用传唱的方式来言说严嵩之恶,更易于被接受和传播。王世贞《当庐江小妇行》除了有朱东润所言“泄私愤”外,陈田《明诗纪事》认为“元美《钤山冈诗》可以怨矣”,并附按语云:

元美父蓟辽总督忬,以分宜陷死,考其构祸之由,元美为刑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杨忠愍之死,元美兄弟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会唐荆川阅兵蓟镇,讥切一卒不练,及寇由潘家口入,京师大震,帝怒,分宜从旁怂臾之,遂置忬重辟,元美《钤山冈诗》可以怨矣。③

《毛诗序》“怨刺”之说是指“下以风刺上”,那么,王世贞出于家难的私情如何能上升为国家之情?其以诗为笔,以“诗传”传情,追求艺术独立,但取得的表达效果与史传并不相同。有关诗与史的异同,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史更具历史的普遍意义。④ 王世贞认为:“大抵文人之才在善用虚,史官之才在善用实;虚者得自创,而实者不得不因。”⑤诗传善用“虚”,以表现作者内心之情为主;史传善用“实”,侧重纪录历史史实。在严嵩形象塑造上王世贞“史才”与“诗笔”结合,虚实相生,姿态摇曳。王国维提出:“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⑥也就是史传因实录而受制于事实,诗传因写虚能够表达出创作者的整体认知和感受,故而能将个体或个案上升至“类”。同时“诗之体与文异”,从文体的内在规定性来说,诗介乎文与词之间,所谓“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诗传往往能够突破文体的限制,追求艺术独立,抒写个人对传主的理解及情感表达,且遵从诗的叙事性和抒情性,同时又极具跳跃性和情感性等特质。

王世贞《当庐江小妇行》将抒情寄寓纪事之中,并非完全依据书写者内心之需进行自由书写。其借助史料,参照外部世界来书写,运用了想象、虚构、讽刺、隐喻等手法以刺严嵩之贪及对嘉靖帝怠政之不满,如记录严嵩仕履:“十五齿邑校,二十荐乡书。三十拜太史,矻矻事编摩。五十天官卿,藻镜在留都。六十登亚辅,少保秩三孤。七十进师臣,独秉密勿谟。八十加殊礼,内殿敕肩舆。”这些内容在《明史》《明书》《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等所载“严嵩传”中都有相应史料,不过诗歌语言具有跳跃性而非线性叙事。当然,王世贞选择乐府诗主要有抒情诉求,那么,《当庐江小妇行》表达出的情感是私愤,还是公愤?是否“可以怨”?

王世贞为严嵩立传时间持久,其对严嵩情感的变化可从其评严嵩诗而见一斑。王世贞《凤洲笔记》卷九《明诗评》有严嵩小传,除认为严嵩早年之诗“气格小缓”外,基本持认可态度。后来在《当庐江小妇行》中认为严嵩“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四库馆臣认为王世贞“亦公论也”⑦。随着王世贞与严嵩关系的恶化,其对严嵩诗文的评价也越来越低。《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严嵩传》称“嵩好为诗,清雅有态,然弱而不能为沉雄之思;文亦类之”。诗评亦是人评,王世贞评严嵩诗的情感判断要多于事实判断。与之相反,他人却对严嵩诗文多持肯定之语,如“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

①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二诗部,明刻本。
② 王鸣盛:《蛾术编》(全二册),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第 1235 页。
③ 陈田辑:《明诗纪事》己签卷一,清刻本。
④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⑤ 《陈眉公先生全集·弇州史料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 4 辑第 53 册,黄山书社 2015 年版,第 113 页。
⑥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 页。
⑦ 《钤山堂集提要》,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集部,清刻本。

文亦典雅严重,乌可以人而废之”①,“严介溪《钤山堂诗》清新婉曲,不得以人废言”②。

严嵩权倾一时,与当时诸多名人文士往来频仍,积攒了丰厚的文化资本,自称“予昔卧痾钤山,……提学李君空同、田君水南先后辱过鄙庐”③。朱国桢也有类似言说:“李献吉督学江西,试士袁州毕,严介溪来见。……献吉亦雅重之。”④除李梦阳外,前七子成员也与严嵩有较多往来,“分宜通籍,即见知于献吉、仲默。……于时子衡、华玉、廷实、子钟、允宁、应德辈,交相引誉。又走使万里,索用修点定其诗,可称好事矣”⑤。除了文人群体外,严嵩与王阳明、湛若水等学者群体也往来密切,杨慎评点其诗作,湛若水为其诗文集撰序。此外,阁臣费宏、夏言、刘节等也与严嵩有较多诗文倡和之作。严嵩身上凝聚了大量的文化符号,在当日文坛声名鼎沸,其《钤山堂集》有湛若水、张治、王廷相、唐龙、刘节、黄绾、崔铣、孙伟、王维桢、杨慎、赵贞吉等 11 人所撰序文,《直庐稿》也有聂豹、张时徹序以及王材跋文。这些序文或跋文对严嵩有诸多溢美之词。此外,诸人还为严嵩撰有赠序、寿序等,边贡、雷礼的文集收录有为严嵩所撰书序、寿序等,这些序跋对严嵩当日文化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精神文化领域扳倒严嵩对王世贞来说是一种焦虑。那么,王世贞又能采用什么样的文化策略,以其个人情感来获得民众认同,而使广大民众产生“共情”?其又是如何将文化资本优渥的严嵩塑造成“权奸”?

三、“权奸志”与“奸臣传”:从个人叙事到史官叙事

从国家层面鼓励和赞许一些情感表达,同时又限制禁止另一些情感表达,会产生出不同的“情感效果”,进而会形成一种“情感体制”,这是任何稳定政体不可或缺的支撑。哪些情感被允许表达与哪些情感不允许表达会对民众的情感偏好产生较大影响。通过仪式、诗文引导等方式也可以塑造民众的情感偏好⑥。王世贞以乐府诗来表达对严嵩的憎恶之情,但毕竟是个人情感,为此,他还运用史传的书写策略,通过历史书写,助推严嵩入史书“奸臣”传。

严嵩为首辅多年,将其列入史书“奸臣传”并非易事。为掌握严嵩传的书写话语权,王世贞采用了多文本书写策略,在官方、民间和士大夫阶层获得多方认可,从而使其所撰“严嵩传”成为官修史书及多家史传书写严嵩传的蓝本。那么,王世贞对严嵩多重书写的背后有着对传主怎样的理解和情感表达?用不同文体书写的严嵩传所采用的情感表达手段又有何不同?

新见明抄本《凤洲笔苑》中卷二为《严嵩志》,王世贞依据“志”体对严嵩奸佞形象进行了书写:

严嵩,字惟中,分宜人也。事行别有纪,兹不详,今为记官阀岁月云。举乙丑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养病归钤山。……寻,改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进太傅,以西苑侍直劳,加太子太师。……十二载满,兼支大学士俸,赐赦宴如前。擒奸细,推恩子世蕃,为工部侍郎,诸孙当授中书舍人者四人,锦衣千户一人。⑦

“志”与“纪”文体不同,这里“事行别有纪”,说明此“志”只记录严嵩为官仕履,其他情况则另有“纪”,而“纪”或为《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严嵩传》初稿。嘉靖三十年严世蕃任工部右侍郎,这篇《严嵩志》大概撰于此时。王世贞《严嵩志》只是简单介绍其仕履,文字简洁,情感倾向不明显,然而在同书卷五《讳志(一)》王世贞却将严嵩列入“权奸”,那么,作为“权奸”的严嵩其情况又是如何?该传内容如下:

严嵩,字惟中,袁之分宜人也。早岁颖悟精解,而体羸多病。举进士高第,改翰林为编修,乃引疾归钤山中,将十年,益读书,好为诗,诗格不甚辨,而清逸楚楚可喜。……嵩初酷谀大学士言,言昵之,引以

①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明刻本。
② 胡维霖:《胡维霖集·墨池浪语诗评》卷二,明刻本。
③ 《题田深甫所藏钤山手稿》,严嵩:《直庐稿》卷五,明刻本。
④ 朱国桢:《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涌幢小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5 页。
⑤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严嵩”条,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9 页。
⑥ 转引李玉珍:《合作治理:新型城市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行动及其治理模式》,《深圳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
⑦ 《嘉靖阁臣志·严嵩》,王世贞:《凤洲笔苑》卷二,明钞本。

为腹心。而后,势位过,稍稍自猜忌。言切骨,欲持退嵩。会给事御史论其纵子世蕃,内货贿诸奸状。言将从中下嵩。窘则走谢言,自理解,跪而搏颡。而上亦竟怜念嵩,亡督过意,乃止。……既逐夏言,归进兼大学士,时位翟銮下。其宠过固銮左,上所与往来启扎,同于家人父子。上时或称辅臣,或字之云。未□銮亦罪免,而嵩威权震天下,四方抚帅方岳遗贪宝珍异,相络绎不绝于道。嵩亦颇自抑下,礼待士大夫。特其阴鸷深毒,所修复私怨,如鹰隼击物,亡不绝吭领者。累加至少师。……于是刑部郎学诗上章条嵩罪,请斥之,下狱。嵩如故。①

嘉靖二十九年,徐学诗上书弹劾严嵩而下狱,《严嵩志》应撰于此时。文中所载多为历史事实,不过"特其阴鸷深毒,所修复私怨,如鹰隼击物,亡不绝吭领者"的说法却是王世贞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表达。严嵩获嘉靖皇帝宠幸,显赫一时。《明史纪事本末》指出:"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②万斯同《严嵩传》也说严嵩"和媚称上"。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杨继盛痛陈严嵩"十罪""五奸",惨遭杀戮。这篇《严嵩志》未列举杨继盛之事,说明此文应撰于杨继盛弃市前。《凤洲笔苑》卷五《讳志》含权奸、狙恶、阴险、愎暴、贪婪、阿党、怀贰、叛逆、妖幻等目,每一目下都有任职官员传记,如"权奸"收录杨宪、万安、焦芳、张綵 、刘宁、夏言、严嵩等传。在严嵩如日中天之时,王世贞已将其列入"权奸"。那么,从王世贞个人的"权奸"叙事到《明史》"奸臣传"的国家叙事,这一过程又是如何转换?王世贞与严嵩交恶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目前记载王世贞与严嵩交恶的史料众多,从王世贞个人叙事、民间叙事,最后演变成《明史》等官方话语的集体记忆、国家叙事。王世贞与严嵩最初相善,后来交恶,其间关涉陆炳、杨继盛、沈炼、徐阶、严世藩等人。王锡爵指出:"分宜相当国,雅重公(王世贞)才名,数令具酒食征逐征谕,相指欲阴收公门下,公意不善也。"③杨继盛弹劾严嵩而惨遭杀戮,王世贞又经纪其丧,并为其妻张氏代写《张宜人请代夫死疏》。④ 隆庆改元,王世贞为父申冤,在写给内阁辅臣的信函中详细记述了自己与严嵩交恶的细节,其《上太傅李公》和《上太宰杨公》两文内容相近,文中申诉了自己受害情况。王世贞直陈严嵩陷害其父的原因以及阁臣票拟之语,平步青对此文用小字注释"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所知"为"王材"、"杨某"为"杨顺",并附评语云:"二段文于分宜奸构,思质守正,荆川谗陷,曲曲传出,而笔力劲挺,直可屈铁,皆从龙门《田窦列传》得来,虽欲不目为佳文不得矣。奸人某某,汪师韩《读书录》云刑部员外况叔祺劾忤失机者,巡按方恪,皆嵩党也。"⑤平步青考证了王世贞文中所涉史实,实证王世贞之说。在为杨继盛所撰《杨忠愍公行状》中王世贞也有类似说法。王忤弃市成了轰动当时的公众事件,对此不同的言说者站在不同立场给予不同阐释。《明史》修纂官综合诸家之说,最后采纳了王世贞的说法。⑥ 王世贞与严嵩交恶成为公众事件,成了众人相信《鸣凤记》(甚至《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或与王世贞有关的原因。

史传注重从国家视角叙事,采用"常事不书"的书写策略,侧重对传主的功业归类,并以国家标准来评判。同时又追求道德高点,通过传记书写进行价值评判。与之相较,私传更注重书写者对传主的理解和感悟。《明实录》载有与严嵩相关的诸多片段,这些片段往往是历史事实的摘录,那么,严嵩成为奸臣的背后依据的是历史真实,还是书写者的情感真实?与严嵩交恶,王忤弃市,成为王世贞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病。作为一代文坛盟主,王世贞运用所掌控的文化资本,将严嵩塑造成权奸。从嘉靖二十九年至严嵩去世,王世贞多次为其撰写传记,力图在文化领域扳倒严嵩。史传是以史实为基础为传主立传,除存

① 《讳志(一)权奸》,王世贞:《凤洲笔苑》卷五,明钞本。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六,明刻本。
④ 杨继盛:《杨忠愍公集》卷五,清刻本。
⑤ 《缥锦廛文筑上》,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七,1917 年香雪崦丛书本。
⑥ 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七列传第一七五,清刻本。

史意图外,与严嵩交恶,将其推入“奸臣传”则是王世贞传记书写的主要动因——将自己对严嵩的厌恶之情上升为广大民众所认同的“共情”。

为将严嵩推入《明史》“奸臣传”,王世贞从不同层面对其进行多维度书写。《明史》“奸臣传”收录严嵩与否,意味着王世贞个人叙事能否上升为国家叙事。在王世贞完成严嵩“权奸”传后若干年,有关严嵩是否入“奸臣传”,清人在修纂《明史》时有诸多争议。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了《明史》修纂官为严嵩辩护的情景:“李穆堂绂记闻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同在史馆的杨椿反驳说:“吾辈修史,但将杨继盛极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申。穆堂闻之,目贻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复申前说。”①李绂反对将严嵩置入奸臣传,却遭到了杨椿反驳,杨椿强调评价历史人物需全面考察。不过明代谈迁、艾南英等对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谈迁云:“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当时以世贞才甚,严氏杀其父,倘文人少年矜诩之过耶。”②王世贞为父申冤,归罪严嵩,艾南英认为不可信,提出:“霍光数昌邑王之过,君子犹以为疑。世贞罪状相嵩,独可信乎?”③对此有人反驳艾南英说:“前辈言东乡好为分宜出脱,是其习气,然窃意东乡持论断断于同席者不相假,岂用回护于众论不容之百年朽骨?”④艾南英或出于同乡之谊,或因“习气”而为严嵩“出脱”。四库馆臣反驳艾南英云:“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⑤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获得了《明史》修撰官认可。最后傅维鳞《明书》、谈迁《国榷》以及查继佐《罪惟录》将严嵩与张居正等置入“权臣传”,而万斯同、王鸿绪和张廷玉主修的不同版《明史》或《明史稿》把严嵩列入了“奸臣传”。

史传首先要考虑的是传主的德行功业,即史评中的忠奸问题。⑥《明史》将严嵩列入“奸臣传”,最初虽遭反对,但最终以王世贞《严嵩传》影响大而成为撰写《明史·严嵩传》之蓝本。严嵩忠奸问题各方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从王世贞个人叙事到《明史》修撰者的国家叙事,“奸佞”严嵩成了压倒性的话语。严嵩虽有诗文集传世,有诸多自撰像赞,却因罢官致仕,难以起到为自己辨解的作用。

四、“权奸”观念下严嵩戏及谣谚的民间化叙事

传记书写者“通过改变人的观念和叙述方式,通过讽刺、嘲笑、挖苦、揭露、批判,让人意识到什么东西是无价值的、令人厌恶的、应该摒弃的,从而唤醒共同的厌恶感,实现移风易俗、改变社会文化之目的”⑦。王世贞通过严嵩传的多重书写意图从士大夫、官方及民间视角对严嵩传进行多方位摹画,呈现出多元的严嵩权奸样貌。王世贞为获得与其文坛盟主身份相符的史权,寓褒贬于笔端,从实录和艺术效果层为严嵩立传:一种以历史事实为参照,追求“实录”;一种是以创作需要为依据,追求审美性。《鸣凤记》作为时政剧,通过当事人或亲历者以时代叙事方式塑造严嵩的权奸形象。虽然目前《鸣凤记》作者为谁尚有争议,不过这一作品的作者之所以被认为是王世贞,是因为王世贞与此传奇有着密切关联。⑧ 且不论王世贞是否确为《鸣凤记》作者,一旦有人将《鸣凤记》与王世贞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意

① 《李穆堂持论之偏》,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 年版,第 225 页。
② 谈迁:《国榷》卷六三,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3950 页。
③ 《书王世贞〈四部稿〉后》,艾南英:《天慵子集》卷一七,四库禁毁丛刊补编。
④ 《书王世贞〈四部稿〉后·附录》,艾南英:《天慵子集》卷一七,四库禁毁丛刊补编第 72 册。
⑤ 《集部总序》,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清刻本。
⑥ 傅维鳞撰《明书》卷一五〇云:“严嵩奸巧阴谲,挟沾沾之小技,以顺为悦,内固主宠,而外笼天下之利,杀谏臣,逐异己,望风投拜者获荣,显刚直自好者婴挫辱,藐法负恩,目无祖宪,虽无孽子,宁毋败也。”张岱撰《石匮书》卷一五〇云:“嵩父子之肆其毒于人主,而二十年。”
⑦ 谭光辉:《情感的符号现象学》,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13 页。
⑧ 《鸣凤记》作者主要有王世贞作、王世贞门人作、王世贞同乡唐凤仪以及无名氏作等说法。从目前情况来看,研究者较认同这一剧品或受王世贞影响,或王世贞直接参与了创作。

味着王世贞因成功塑造严嵩权奸形象而成为“反严”的代表,也即是说王世贞作为严嵩权奸形象塑造者的身份已深入人心。

《鸣凤记》采用舞台表演与“声传”相结合的形式传情达意,成为当时流传较广的剧品,使严嵩“奸臣”形象获得了社会广泛认可。袁翼云:“月色江声旧草堂,梨园弟子竞登场。先演弇州《鸣凤记》,次演东锡《中山狼》。”①可见《鸣凤记》当日演出之盛。严嵩戏呈现出民间叙事及时代叙事特质。明代中后期原有的社会伦理秩序松动“失序”,逐步走向庶民化社会,民众对皇权及权臣有了一定“清议”及批判能力。严嵩身处高位,与同僚有着诸多利益纠葛,传记中对其或褒或贬,受王世贞“权奸”观念影响,严嵩民间形象走向了负面化。《鸣凤记》是在“严嵩父子已革职”后,便被迅速搬上舞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赵翼提出:“明人演戏多有用本朝事者。”②,严氏败后,《鸣凤记》便开始流行,剧中的严嵩、严世蕃、赵文华、鄢懋卿等奸臣与夏言、曾铣、杨继盛、林润等忠臣形成了鲜明对比,创作者着意刻画严嵩迫害忠良的奸佞形象。《鸣凤记》第十六出《夫妇死节》写杨继盛被施以死刑的场面,夏言等反对严嵩的十位大臣被誉为“双忠八义”,即“前后同心八谏臣,朝阳丹凤一起鸣。除奸反正扶明主,留得功勋耀古今”。

不同于从视觉层对传主容貌和内在精神进行塑造的“像传”,严嵩戏在传播上兼具视觉与听觉效应,打破了文本仅传播于识字阶层的限制,戏剧角色的扮相与唱词更容易在大众中传播。而相对于视觉的抽象描述与理解,声音与唱词更为大众所青睐。王世贞《当庐江小妇行》意图从听觉上“被之古声”,却因用词太雅,欣赏门槛过高,大众接受起来较为困难,只能在士大夫阶层传播。相对而言,戏剧在通俗化、民间叙事等方面更具感染力。

就人类感知而言,听觉具有顺从性,更容易被塑造,荀子提出“礼别异,乐合同”,指出音乐或声音在情感塑造上使人走向“合同”,特别是在建构情感共同体方面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系列”,“即使在小说中,语音的层面仍旧是生产意义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③ 如果把严嵩戏视为一种特殊的传记形式——“声传”,其实是一种民间视域下的“听觉文化”,创作者的情感偏向能够达到一定的政治功能,听觉与文化记忆、情感认同、身份建构等产生内在联系,起到了对听觉主体的塑造和改写功能。“声传”能激发听众的情感和共鸣,声音和表演参与了听觉文化的建构。严嵩权奸形象通过声音传播和舞台表演凝聚为大众共识,形成了潜意识论断。此时声音被书写者的书写意图裹挟,听者因无法参与声音的制作及传播,从而形成严嵩“声传”的群体听觉认同。

王世贞所撰《严嵩传》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后,引发了民众从民间视角书写奸臣严嵩的热情。人们依据权奸观念不断丰富严嵩的奸臣形象。侯方域《马伶传》是写名伶马锦的故事,借严嵩之事批判权奸魏忠贤④。据后文,遁逃的马伶到了“今相国昆山顾秉谦”家为仆,日侍顾秉谦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最后再回故地,挫败了“李伶”。为此,侯方域感叹“以李伶为绝技,无所干求,乃走事某,见某犹之见分宜(严嵩)也,马伶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⑤马伶以生活原型为师,不断丰富对“权奸”形象的塑造,最后获得了全胜,说明作为奸臣的严嵩在民间不断被重新理解和塑造。马伶所扮演的是早已被大家认同的严嵩,严嵩形象的塑造有多方参与,是表演者或传记书写者对严嵩的共同理解,这些理解并非是对传主历史事实的甄别。

在与严嵩相关的文学作品中,表演者或传记书写者依据“前理解”或权奸概念不断丰富严嵩奸佞形象。此时大家已不关心严嵩的史实真相,而是将奸佞观念反作用于作品,将文本事实等同于历史事实。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对当时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现象予以批评,清人评点此文云:“是时严介溪揽权。俱是乞哀昏暮,骄人白日一辈人,摹写其丑形恶态,可为尽情。末说出自己之气骨,两两相较,薰莸不同,

① 《康山草堂歌》,袁翼:《邃怀堂全集》诗集前编卷一,清刻本。
② 《明人演戏多扮近事》,赵翼撰,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二〇,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27 页。
③ 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若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66 页。
④ 《马伶传》,张潮辑:《虞初新志》卷三,清刻本。
⑤ 《马伶传》,张潮辑:《虞初新志》卷三,清刻本。

清浊异质,有关世教之文。”[①]王世贞也极力将严嵩与坏事物联系起来,如写严嵩被贬,就联系到贫死,《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严嵩传》云:“嵩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无吊者,時年八十有六。”[②]而《介桥严氏族谱·少师介溪公传》则云:“回里后,往来秀渚,机息驱群,意殊怡然。……正坐,振笔书云‘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逝。”[③]严嵩卒年“八十七”,王世贞却写成“时年八十有六”。似乎把奸臣的结局写得更为悲惨才能达到“恶有恶报”的读者期待。明清诸多严嵩戏,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打严嵩》《打红袍》《五女拜寿》等,多是以严嵩为题材;近代《打严嵩》曾多次上演,《申报》1913—1924 年曾多次登载吴铁庵、周信芳等主演《打严嵩》的广告。此后周信芳、马连良等多次主演,还合灌有唱片。民间化的严嵩形象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和传播,此时大家关心的已不再是严嵩形象的真伪问题,而是从民间视角如何理解权奸的问题。

严嵩奸臣观念确立后,民间的创作热情被激发出来,严嵩被视为“近代权奸之首,至今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骂,万眉山(万安)以后所仅见也”[④]。人物形象的民间塑造往往需要更为通俗的形式。谣谚作为民间叙事方式,是时代情感情绪及思想观念的呈现,也是严嵩现象的谶示兆验的一种展示。明清笔记载有诸多严嵩谣谚,可与严嵩戏相呼应。谣谚以口耳相传,以声音为媒介,容易形成情感认同。据明代史料记载:“严介翁嵩、夏桂翁言,俱江西人,同时柄政,京师语云:……严介溪,人可欺,天不可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后二公俱败,果符其言。”[⑤]明代中后期印刷术的发展使邸抄、朝报等不断刊印,信息传播加速,民众的批判能力增强。《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⑥]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已大大降低,民众具备了清议便利。谣谚在宣泄舆情的同时,更有了刺政的功能。京师谣谚为人心所向,是民间情绪的表达,所谓“怨谤之气发于歌谣”。以螃蟹喻严嵩在沈德符所编《万历野获编》卷二六《借蟹讥权贵》中有这样的记载:“分宜擅权,枉杀贵溪,京师人恶之,为语曰: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权贵,然亦一蟹不如一蟹矣。咏严后二句,或又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语,亦确。”[⑦]说明当日严嵩在民间已成贪婪权奸者形象,这与王世贞的意向性多重传记书写及情感表达有着密切关系。严嵩贪赃误国,残害忠良,这种民间叙事方式表达出时人对其普遍厌恶之情。这些谚语传播速度快,对严嵩奸佞形象的广泛接受起到了助推作用,而“共同的厌恶感的转变甚至可以移风易俗”[⑧],获得社会普遍认同。

综上,王世贞多文本“严嵩传”的背后是其与严嵩复杂的情感纠葛。王世贞试图通过个人情感表达以引发民众的共情,将个人对严嵩的仇恨转化为广大民众对严嵩的仇恨,并通过多重传记书写将历史事实转化为广大民众所能接受的文本事实,并以自我认同的文本事实来替代历史事实。严嵩形象不断演变,后人对其不断有新的理解和塑造,但其权奸形象却日趋凝固。王世贞所表达的对严嵩个人情感最后被《明史》等官方话语采纳,上升为国家情感和历史记忆。此外,清代京剧《打严嵩》《大红袍》《五女拜寿》等以严嵩为题材的戏剧经久不衰,从而形成了“严嵩文学”的“声传”现象。当然,史传所反映出的民族思维能力,对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维系民心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声传”还有声音治理,构建情感共同体的功能和作用,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述。

(责任编辑:素微)

① 《报刘一丈书》,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六点评,清刻本。
②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四,明刻本。
③ 《介桥严氏族谱·少师介溪公传》,曹国庆等:《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3 页。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一,清毛氏汲古阁刻本。
⑤ 李春熙:《道听录》卷二,清钞本。
⑥ 《东林党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六,清畿辅丛书本。
⑦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借蟹讥权贵》。
⑧ 谭光辉:《情感的符号现象学》,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95 页。